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亲历者言】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司徒文
【读史笔记】	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	金大陆
【史海钩沉】	第一座毛主席像修建始末	杨涵舒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亲历者言】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 司徒文 ·

—

北大为期4个月的武斗，发生在1968年春夏。

过去政治课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我觉得文革中的武斗也有点这种意思。再说，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就使得“武斗”在当时已经“合法化”，可以说是中央文革放纵了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从1966年9月开始，北京就有武斗发生，1967年已经蔓延到全国，各个地区都狼烟四起，战火不断。1968年首都北京的高校也传染上了这种瘟疫，年前清华大学井冈山与井冈山“414”已经接上火，其他院校也时有发生。

当时的北大，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新北大公社，一派是井冈山兵团。前者是原先拥戴北大当时主政的聂元梓校文革的几个群众组织合并以后，在校文革支持下，于1967年4月成立的；而井冈山兵团是原先反对聂元梓校文革后来被打散重新集结，和从聂元梓校文革拥戴者里分化出来的一些人联合组成的群众组织，于同年8月成立的。原先在1967年初，聂元梓校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势大气粗，对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采取了“白色恐怖”式地镇压、排斥的压伐政策，许多都是后来的新北大公社各级头头具体实施的，而井冈山兵团的组成人员，正是聂元梓校文革的“受害者”。所以，自从井冈山兵团一成立，两派就拉开了架势，要拼死拼活地大干一场。因此，矛盾不断激化，对立不断升级。但是平心而论，这两派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更不势均力敌。聂元梓校文革凭借中央文革的支持，利用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兵团实行打压。井冈山兵团不知道有什么背景，也不买对方的账，进行着顽强的抗争。由于文革错综复杂的原因，他们也有许多支持者。北大武斗开始前夕，几个高校群众组织的许多人，到北大来声援井冈山，不惜与新北大公社发生激烈的摩擦，就是明证。

1968年2月底，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单独接见井冈山的代表，一是劝他们承认聂元梓，承认校文革是北大的权力机构，这是中央的意见；二是承认北大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为北大文革作出过很好的贡献，聂元梓校文革要承认它；三是北大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如何成立，双方协商解决；四是解放军支左不支派。对此，井冈山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校文革”，聂元梓校文革则向中央文革反映说李的讲话在北大引起了混乱，并且声称怀疑李的讲话是否存在，是否井冈山造谣。双方互不服气，攻击加剧。各自的高音喇叭，全都安放在楼顶。9个一串，如同糖葫芦一般，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想朝哪个方向定向播音，就向哪个方向播音。公社的头头被骂的是聂元梓，井冈山的头头被骂的是牛辉林（井冈山的“寨主”最早是原来北大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他听从周总理注意国际影响退出群众组织的劝告后，不再担任，由牛辉林继任），骂声天天不绝于耳。这边的高音喇叭上挂了一串破鞋，叫嚷着“聂破鞋和她的徒子徒孙们”，那边则是“牛头山的蒋军弟兄们，不敢来进攻我们就不是牛种”。叫骂之声，西至颐和园，东至五道口，方圆十几里内都听得清清楚楚。于是，这一派的高音喇叭就成了另一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拥有高音喇叭的宿舍楼，就成了进攻的首要目标。刚开始时，是公社仗着人多势众，趁另一派不备，蜂拥进另一派的楼，进行破坏。而井冈山则叫来援军火速增援，再加以反攻报复。

这段时间，北京“地派”对北大井冈山的支持逐步升级，反对聂元梓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3月20号，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开始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后几天，“地派”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反对聂元梓，支持井冈山，并发生小规模武斗。谢富治、吴德、丁国钰25日赶到北大讲话，表态反对武斗，但是，北大的武斗还是不早不晚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

3月29日凌晨，38楼的同学正在熟睡，忽然寝室楼道里有人急喊：井冈山的人血洗了31楼，正准备攻占校医院，大家赶快起床，击退井冈山的进攻！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跟着人们溜一小跑，来到燕南园南边西头，与人们站在这条路去往校医院的路口。不一会儿。就仿佛看见有人从东边向这里走，这时带队的就喊：快，扔石头，把他们打回去！我们就趁黑摸着不知道是早就准备好的还是另外有人当即运来的砖头块。向对方人群扔去。我扔了两下，觉得胳膊就不行了，而且对方也再没有人向这里走了。这边人们好像也有人撤走了，我就也悄悄地一个人溜回寝室。这就是我在北大参加的惟一次武斗的经历。

当天晚上，同宿舍参加井冈山的一个同学也出去了，晚些时候才回来。第二天人们议论昨天的武斗，就听他嘟囔了一句：还不知道谁血洗谁呢。

后来才知道，3月28日是星期日。聂元梓与新北大公社早有预谋，要从31楼化学系井冈山的同学开刀。因为这里住着井冈山的主力与骨干0363（化学系63级），31楼还是个战略要地。公社的孙蓬一布置这一行动时说：化学系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同学互相残杀，高云鹏这位武斗总指挥也避了点儿嫌：攻打31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09系招募的，怕他们不了解31楼的住宿详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了记号。

29日深夜1点整，公社武斗人员全副武装实行突袭，把31楼洗劫一空。遇到公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只是往外撵。假如是井冈山的，就会被打伤。一些公社的同学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往外走，被公社武斗人员撞见，没来得及说明身份，也被扎伤了。许多同学从睡梦中惊醒，怕挨打，迷迷糊糊急急忙忙向外逃，什么都没带。更有甚者，见来者不善，就

从二楼甚至三楼往下跳，摔伤者甚多。加上被打伤的，共有100多人，个人物品、公共财产都蒙受了重大损失。

这里我把3个不同身份的同学对“3·29”31楼被洗劫的回忆摘录如下，可能更显得真切、公正。

首先，我们看看化学系公社派62级的一个姓田的同学的回忆：

3月28日下午形势急剧恶化。两派的大喇叭鬼哭狼嚎：谁挑起武斗了，强烈抗议……看情况不妙。我把邮票和少量重要东西收拾了一下送到北大附中我二弟处，并要他第二天一早帮我“搬家”。回来后天已快黑了。我到31楼后面看了看地势，盘算了一下如果需要该如何逃出31楼……

吃完饭后许多同学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却又不知如何是好，静等灾难的到来。约8点，公社头头×××（类似情况以下都不指名）挨室告诉：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大家要有准备。我问：“该怎么准备？”他却答非所问，支吾了之。其实他心中大概早已有数。

我在大喇叭的狂吼中入睡。半夜时分突然一阵人声、铁器撞击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井冈山攻占31楼！”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头。我赶紧穿了衣服，开了灯，推了推上铺的××：“井冈山来了！”他毫无反应。我推开窗户上了窗台，转过身来，用手抓住窗台，伸下脚踩住一、二楼之间的突出砖棱。接着我放开手，做自由落体，用手又抓了一下砖棱，略曲腿，落地。这是事先早已计划好的。落地时我只倒退了一步，毫发未伤。这时我才想到：××不能跟我这样下来，文革前他受过一次伤。同一宿舍还有×××，我希望避免同学之间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出了31楼，往哪里跑？我钻向学六食堂（此处可能有误，应该是学四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站住！长矛！”一声断喝。一群身穿黄棉袄、手持长矛的武斗队抓住了我。接着铁棍、扎枪也上来了。我的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所幸不重。有4·11（1967年4月11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到北大游行，反对聂元梓。与新北大公社发生冲突——作者注）经验，我以为又是“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暴徒”来了。“你是哪里的？”“我是北大的！”言外之意：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了个看样子是个头头的：“我们是公社的，别怕！”我还是不信，一言不发。估计他们也想到，如果我是井冈山的该往东边28楼方向跑：“大概打错了人，送43楼治伤。”我摸出身上带的学生证，里面夹着一张“二期学习班”的证件。“是自己人！”于是他下令赶快将我送往43楼。在此之前我还未“有幸”进过这里。43楼早已有所准备，“野战医院”大夫、设备一应俱全。我是这次大武斗公社方面第一个伤员，又是被“自己人”误伤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治疗。1969年1月在呼和浩特遇到中文系的赵君、无线电系的陈君，他们正在讲：“公社3·29武斗第一个伤员是被自己人打的。”他们问我知道吗……

下面是外校一位大学生的记忆：

1968年3月29日凌晨，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首领为聂元梓的密友高云鹏），切断31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当时，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着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瑟瑟发抖。

3·29那天晚上。被迫跳楼逃出被包围的31楼化学系62级学生人数就超过17人。其中五六个人受了伤，有的是赤手空拳穿着内衣跳到楼下，就被对方的长矛手扎穿胸部，造成严重的气胸。没有跳楼的也是在睡梦中被拿着棍棒的武斗人员轰起床，殴打、驱赶着被迫离开自己的宿舍楼，除了贴身衣服，什么也不让带。

“3·29”武斗还波及到别的楼群，住在35楼的一个井冈山派的女同学回忆说：

当时我和小×已进入梦乡，突然被一阵突发的嘈杂声惊醒了。我们不敢开灯，悄悄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只见井冈山男生住的30斋那边灯光乱闪人声鼎沸，有男生变了嗓音地嘶喊：“公社派的攻楼了！”接着我们就看到有些井冈山的男生只穿着汗衫裤衩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跳下来，有的刚刚落地就被胳膊上绑白毛巾的人用铁棍狠狠地戳打。小×焦急地说：“这样跳下来，又被这样子暴打，人还能有救吗？”我当时除了惊恐愤怒，剩下的就是透骨的无奈，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亮之后，校园里议论纷纷。听我们班井冈山的男生说，当天夜里他们住的40斋也同时被新北大公社的人突袭了。包围之后一部分人还冲进了楼里。井冈山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往外冲，有的也从二楼三楼窗口往下跳。不少人冲出来时被对立派从楼上扔下的砖块砸破了脑袋。有的被对方用铁棍、长矛打伤。

这次武斗中受伤的同学不计其数，我们班的男生Y被公社派的人用铁矛刺成重伤，送进医院急救。医生说他身上总共被刺了17枪，幸而都不在要害部位，侥幸保住一条命。但有一枪扎在大腿的股动脉和静脉之间，造成动静脉瘘，那部位还长了两个瘤。后来又在北医三院做了13个钟头的大手术。怕他父母担心，不敢告诉实情。是我们班的男生W代替家长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从武斗开始。双方的大喇叭就没停歇，都说对方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武斗，罪该万死。新北大公社当然是喊喊捉贼。天刚亮，李钟奇等赶到北大，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然后由聂元梓陪同，视察武斗现场，走到31楼前面时，围观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人来，用什么东西刺向聂元梓的头部，等人们回过神儿来，“刺客”已经没影了。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立即抓住此事，发动猛烈宣传攻势：井冈山的暴徒用匕首行刺李钟奇、聂元梓，聂元梓受重伤，强烈谴责井冈山暴徒的血腥罪行，井冈山必须交出凶手！

事有凑巧，毕业后到河北阜城插队接受锻炼时，我们在杨庙一个村的有10个人。当年的“刺客”就在其中，就是化学系三年级的×××。据他说，当时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伤了那么多同学。反而反咬一口，诬蔑说是井冈山挑起事端，他实在忍无可忍，怒不可遏，那天早晨听说聂元梓陪着李钟奇视察，他顺手拿起桌子上的电笔改锥，冲入人群就朝聂元梓扎了上去，由于着急，聂也躲闪，只是划破了她的一点头皮。这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没有任何人指使，跟井冈山总部无任何关系。新北大公社那么说，纯属造谣。事后，他也觉得公社决不会放过他，早早就逃亡了。几十年后，我们一起插队的这位“刺客”的一位同年级同学告诉我，实际上，说他逃亡，是向外放的烟幕弹，其实并没有走，而是井冈山的主要负责人侯汉清觉得这样疾恶如仇、“仗义执言”的人应该受到保护，把他掩护起来了。藏匿的地点十分秘密，连同班同派的同学都不知道，一直到有关方面不再追究。

果不其然，不光是新北大公社，连李钟奇副司令员也认为凶手刺杀聂元梓，应该抓起来。看来，这位“刺客”同学当时如果不及“蒸发”，关押、酷刑是免不了的。弄不好，还会有生命之虞。原来，北京卫戍区要求双方各派5名代表，由校文革和解放军一起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事宜，井冈山认为如此不公，拒绝派人参加。当天晚上，谢富治、温玉成（卫戍

区司令员)、李钟奇到北大开会,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一是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是井冈山立即交出刺杀聂元梓、李钟奇的凶手;三是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的人员立即撤出,做自我批评;四是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谢富治还批评井冈山斗争聂元梓。校文革发出抓捕凶手的《通缉令》,《新北大》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的文章。4月4日晚,李钟奇又来北大,限令井冈山兵团3天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11日,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校文革组成的“制止北大武斗监督小组”负责人发表讲话,责令井冈山兵团交出凶手和后台,否则,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处理,井冈山不服气,不执行,聂元梓等则有恃无恐,继续对井冈山施压。北大武斗人员还将到北大阅览室翻阅期刊的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一个学生毒打致死,孙蓬一竟然对打死人者说:“他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还安排假调查,瞒天过海。4月25日,井冈山驱赶住在36楼的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占领了此楼。翌日,新北大公社又派出重兵收复36楼,发生大规模武斗。孙蓬一亲自到武斗现场指挥。双方200余人受伤,大量公私财产损失。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25、27、17、18、19、20、21、22、23和24等楼群,形成了对井冈山占领的28、30、32、36、37楼的包围,并逐步对他们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准备“五一”节前将其打垮。北大校门南面是海淀路,马路南面,有一条有名的胡同,叫做军机处,就是多次在清宫戏里出现的那个名字。紧挨着军机处有一个饭馆,叫长征食堂。为了堵住这个出口,公社派的学生就占领了这个长征食堂,在里面架上了强力弹弓,对这几座楼实行封锁,并企图攻下这几座楼。

由此,北大武斗不但没有停止,还在逐步升级。

三

“3·29”武斗之后。像我这样的学生都盼着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能尽快制止武斗,还我们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但是,几天、十几天过去了,武斗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反而都在准备升级,心里十分不安。后来,听说中央文革要派一个级别较高的军人,来北大常驻,领衔制止武斗。我们左等右等,“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却等来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此人深知北大情况复杂。不肯来北大趟这片浑水。太让人失望了!几年来一直把考到北大读书引以为自豪的我,这时居然懊恼地想道:怎么考到这么一个是非之地,不让念书不说,连基本的正常生活都不能维持!

对于参加武斗,我从内心是坚决反对的,一开始参加是担心其他人说自己胆小怕死,不敢上战场。另外,也有点好奇。想看一看武斗场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后来听说了“3·29”武斗发生的真相,就觉得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太不厚道了。这不是明明欺负人家吗?当然,当时也相信了公社的宣传,认为无论如何,井冈山也不应该派刺客行刺,这不是流氓行径吗!“春秋无义战”,这就是当时我头脑里对北大武斗的评价。既非“义战”,就不参加,干吗要为派性充当炮灰?心里这么想,嘴上不能说。不然,会说你动摇军心。惹不起,躲得起,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这时候我们历史系与哲学系学生居住的38楼,空气也日渐紧张,把参加武斗保卫新北大公社、保卫校文革当做保卫“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无所谓,我们这一类人就觉得太缺乏安全感了。看着他们热衷于备战,我则决心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正好我一个要好的同学从北京市区家里来学校察看动静,见状,就邀请我去他家里住。开始我担心给他添麻烦,不同意,他执意让我去,盛情难却,只好背着被子,跟他去住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我坚持要回学校，同学没拦住。下午我背着行李，乘公共汽车从海淀站下车，到了北大西南门，却见几个手持长短扎枪的公社战士守卫着门口，盘查过往行人。只见一个北大同学，不知是哪个系的，可能是井冈山的，背着一个破棉絮，可能是要求进去，说他在外面无处栖身，公社守门的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个同学苦苦哀求，差点儿掉眼泪了，守门的似乎铁石心肠，不为所动。对他极为同情的我当时也不敢多嘴，只是向守门人说明了我的身份，没有受到阻拦。校园里一派战前紧张气氛。我到38楼北面西头的门口一看，门口堆满了砖头，正要上楼，一个女同学恰好下来。她一边码着要搬的砖头。一边力劝我赶紧参加“战备”。说近日武斗还要升级，井冈山可能攻击38楼。所有公社战士都要投入紧张的备战之中，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接受考验的大好机会。听着她的这番话，我觉得既可笑又可悲，但我一声未吭，背着行李就离开了。我是决心不参加武斗。不为派性尤其是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当炮灰了。38楼是不能回了，到哪去呢？出了校门，我为难了，再去同学哪里，显然不合适，可眼下走投无路啊！想了一会儿，我决定先找家在学校附近的另一个同学商量一下，他家就在海淀前观园。结果他恰恰不在。我把被子寄放到那里，无可奈何，还是得回住过的哪个同学家，结果他家也是“铁将军把门”。怎么办？我想了一会儿，决定先到天安门广场转一圈，然后再说。

天安门广场游人不多，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转了一会儿，没意思，肚子也有些饿了，可没心思找地方吃饭。转悠到广场上的国旗旗杆下，就依着下面的水泥墩坐了下来。望着天安门广场上初上的华灯，万般滋味涌上心来：这叫什么事儿啊，大学上得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当时真有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让人欲哭无泪！

我心里无奈地不停地琢磨：今晚和今后一段时间去哪里落脚啊？去找同学，最多住一晚上，解一解燃眉之急，以后呢？想来想去。忽然想起昌平区北太平庄我们系文革前夕这个半工半读的基地，哪里平时只有一个林业技术员和一个姓崔的大师傅，他们平时备感孤单寂寞，特别希望有人到他们那儿去住。我还记得，晚上9点多从西直门到南口有一趟客车，自古华山一条路，只能如此了，而且必须今晚就去！结果老天相助，我匆匆忙忙回到同学家取了行李，饿着肚子，赶上火车，从南口下来又壮着胆子走了沟沟坎坎15里乡间小道，于深夜平安到达太平庄。人们见我连夜从学校赶来，不胜惊讶。听说了学校的情况，又感慨不已。我就在这里躲避了两个多月的“战乱”。

四

7月份，班里通知我必须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又背起行囊，重回燕园。

这时，经过武斗的“洗礼”，北大校园已是另一番模样：千疮百孔，弹痕累累。尤其是宿舍楼，不少窗户或者没有了玻璃，或者干脆连几扇小框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大窗户框，井冈山占领区的宿舍楼更惨，很多窗户连木头框也没有了，远远望去，只能看见一个黑洞洞的大窟窿。甚至楼房的砖墙。也被这里掏几块砖，哪里掏几个洞。学校的不少地区。都成了“军事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不然安全、生命就没有保障。即使人们的必经之路，随时都有受伤甚至生命危险。我回去后依然住在38楼，这里仍然是新北大公社的地盘，但东头对面，就是35楼，斜对面37楼是井冈山的领地。双方在四楼的各自窗户上，都安装了特制的弹弓。这种弹弓，以底朝上的双层床腿为弹弓架，用2—3副自行车内胎做弹弓皮，半截砖头为弹弓子，拉弓时，必须两个人，后边的抱着前边人的腰，这样才能拉得起来，把砖头打出去。我曾经试了试，一个人根本拉不动。当然，这种弹弓子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住在38楼的人打开水，必须经过35楼和37楼弹弓的射程之内的地区，所以人们哪怕多绕不少路，也不冒这个险。可有一次，我想侥幸一回，因为双方处于好长时间的相持阶段，不但没有军事行动，连弹弓也许久没人打了，就提了暖水瓶去锅炉房打水，从学

六食堂东边过去。回来时，快走出对方射程范围时，“咚”地一声，一块砖头陡然射来，砸在学六食堂的东墙上。距离我只有半米之差，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现在想起来还后怕。无独有偶，后来我看到井冈山一位同学回忆这种弹弓的厉害，不寒而栗：

（19）68年5月的一天中午，我从28楼回37楼午餐，顺便就到37楼2楼西头朝北（38楼方向）一间盥洗间去把安装的高音喇叭扶正一下（方向稍微有点歪了）。没想到仅几秒钟就被斜对面38楼的大弹弓的神弓手瞄准击中，一块半头砖直飞我的面前，慌忙之中我下意识地张开嘴，正是这一口救了我：我当时“吃的”砖头正中口腔上下牙之间，阻挡了冲力。但把上下各2个门牙齐根打断，嘴唇全部打烂，血肉模糊。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再高几公分，那块半头砖就是致命的了，大弹弓的射程有300—400米远，37楼到38楼不超过100米，飞来的半头砖威力不会比子弹头小。不过这断了的4个牙也影响我一辈子：导致其他牙齿一个接一个损坏，早早就戴上了全口假牙。

新北大公社把井冈山牢牢包围在28、30、32、36、37这5座楼中。我曾瞅个机会远远观看了井冈山占领区的境况，让人不胜感慨。从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新北大公社，早已经把井冈山占据的几座楼封锁成一个个孤岛。他们不能出楼，不然就会受到各种攻击。他们为了打通楼与楼之间的通道，采取了3种办法：一是地面上，楼与楼的通道，两边都用学生寝室里的双层床一张挨一张再用钢丝连接起来作为护墙，上面还用一张张单人床扣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结实而又安全的封闭空间。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通过，弹弓和长矛都对行人不会造成伤害，这是主要的通行办法；另一种，就是楼与楼在高空上搭起天桥。这只是在28楼与30楼之间。28楼是工字型楼。南端西头与30楼东头距离最近，井冈山在学校找的木料，就在28楼楼道里施工，用大铁铆钉做成桥梁架构，然后从28楼向西推，上面套上绳子甩到30楼东头向西拉，就这样，在两座楼的最高层四楼架起了一座燕园史无前例的特制的天桥。井冈山人在上面通行，也能保证安全无虞。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广播站等许多重要机关都在28楼。所以井冈山拼死拼活也要保证28楼与其他楼的畅通。而30楼又是36、37楼通往28楼的咽喉。从29楼与28楼之间的地下向南仰望，井冈山那座天桥赫然在目，他让人感叹那个时期的大学生身临绝境中无奈求生的可悲，又让人敬佩天桥策划制作及安装指挥者的胆略和精妙。三是挖地道。据说由地质地理系同学设计并监督实施，一人高，并排可走两人，其中还有电灯照明，昼夜均可通行。武斗结束后不久，一场大雨，把地道冲塌了。井冈山人都暗自庆幸。

后来又听说，由于公社头头的不人道，经常下令无规律地停电停水，井冈山的人们受罪受大了，到做饭的时候，刚做了一半。停电了，饭半生不熟，怎么办？如此受耍弄的事不少。水更成问题，没水，喝水、吃饭、洗手、洗脸，特别是厕所冲刷，都无法解决。赶上天气越来越热，人们的日子越发不好过。所以，井冈山人又想了个法：把不住人的宿舍整个用水泥抹了，变成一个个大水箱。水龙头永远开着，什么时候来水都能存下。结果水还没有存满，由于压力过大，便从砖缝里往外渗，最终没有成功。听到这些，真让人哭笑不得。公社还对井冈山实行了断粮断菜，6月24日，北京运输三场应井冈山总部之邀，给困守在几个楼的井冈山人员送肉送菜（井冈山人零星到海淀买菜，常常被公社武斗人员捕捉和毒打），公社武斗头头命令武斗人员两边夹击，井冈山预先也派出人员保护，东边是03化学系同学，西边是02系同学，双方发生武斗，东边的顶住了，西边的却溃退了。结果化学系的头头姓王，被公社武斗人员打翻，扎了10多长矛。幸亏他里面戴着自制护甲，才没有危及生命，但是也受了重伤。公社武斗人员还砸坏了北京运输三场的汽车，打伤了3名司机，其中一名扎成重伤。井冈山人员吃着用同学的鲜血换来的蔬菜，不少人都难过地掉下眼泪。而那位受重伤的王姓同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文革后考上了研究生，还当了年级的支部书记。

由于公社不时地停电，让井冈山人员苦不堪言，井冈山决定自己解决问题，将37楼旁边校园南墙外面不远的高压线拉到自己占领的楼里去。公社得知这一信息。也决定届时从两面攻击，让井冈山的自我解救计划流产。7月22日晚上，我与许多同学从西南校门外面观看了这场接电与反接电的“战斗”。记不清是晚上几点了，井冈山的接电人员“全副武装”，出了从南面自开的校门，爬高压电杆时，他们用木板做了一个箱子，人在里面，随着人向上升起，木板箱护着人同步升起，下面则有几十名手持长矛的人员平地保护。这时候，早已埋伏在西南校门和东南校门的公社武斗人员，立即冲出来，三人一组，两边两个短枪手，中间一个长枪手，从海淀马路的东西两个方向上向接电的高压电杆处发起进攻。顿时，传来一片喊杀声。但是，公社武斗人员虽然人多势众，却一直没有能够进攻到接电的地方，中间相持时，看不清是谁还扔了燃烧瓶。“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马路堵塞，32路公共汽车停驶。这场武斗以井冈山接电成功而结束。事后，公社参加武斗的人员说，从马路上冲过去。快到井冈山地盘时，只觉得脚下个劲儿打滑。不少人摔倒了，大家站立都很困难，这样战斗力大减，根本到不了他们跟前。后来才知道，井冈山深知寡不敌众，跟公社硬拼没有好果子吃，关键是接也接不成，今晚的行动就会半途而废，所以他们采用了“撒豆计”，在接近他们领地的东西马路上撒了几十公斤绿豆、黄豆、红豆，公社武斗人员不知道，多数人员到了地方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没法投入战斗。他们的攻击和破坏行为才没有得逞。此后，连公社武斗人员也都佩服井冈山有关人员“撒豆成兵”的聪明才智。对于接电成功，大家更是惊讶叹服，因为当天晚上的接电是10千伏高压带电作业，那个年代，专业的电工也不敢如此冒险操作，据说，这在北京市解放后电业系统也算是史无前例。还有人说，具体操作的是技术物理系的两个学生，事后不久，他们就被北京市供电局作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要走了。还有一点，可以算作武斗轶事：井冈山中一些胆大者，第二天早起，又去“战场”上把豆子扫回，还泡了豆芽，享用了一番，馋得其他“井冈山战士”直淌口水。

公社武斗人员凭恃自己派别权高势大，人多气粗，对井冈山的人能抓就抓，能打就打，能斗就斗，对没有参加公社的同学也视为异己分子，看着不顺眼，说打就打，毫无人性，甚至草菅人命。由于“3·29”武斗开始以后，新北大公社把全部学生食堂都控制起来，不但井冈山的同学不能去用餐，而且限制所有非新北大公社派的人用餐。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无线电系62级的殷文杰同学就是其中最倒霉的一个，他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公社的武斗队员们追上用长矛刺穿股动脉，尽管他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一天下午，我在38楼4楼的阳台上，亲眼看到公社的几个武斗人员，从外面挟架着一个人，扔到西南门里的马路上，然后开始毒打，先是拳打脚踢，后来干脆用长矛扎，只见一枪下去，这个人身上的鲜血蹿出来一尺多高，有人说可能是扎到动脉上了。看到这个惨烈的场景，我的心不住地怦怦跳动，真是令人发指！后来这个人又不知被谁拉走了，生死不明。后来看到《北京大学纪事》上记载：“1968年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我看到的那个场景可能就是这个被伤害的刘玮。

五

“7·22”公社对井冈山接电实施破坏未果以后，有些恼羞成怒，也许担心井冈山如此得以喘息，将来不断壮大，更不好收拾，于是，便决定提升武器档次，使武斗升级，彻底消灭井冈山。他们在校园北部开始试制土炸弹、土坦克等等。

7月27日，我们在学校突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不明身份的10万人，有工人，有解放军，包围了武斗已经升级为枪炮级的清华大学，蒯大富武装抵抗，打死工人5名，打伤

1000多名。当天晚上，聂元梓、孙蓬一召集系文革主任、公社战斗团联席会议，针对清华的情况，商量对付强行进入高校的工人、解放军，决定：（一）拒之门外，让进校者派代表与校文革协商；（二）抵挡不住，则退入楼内，各自为战，做到人在楼在；（三）最后不行，聂元梓就带领人们到北大荒去等等。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多，只知道通知住在38楼的学生。不管是公社的，还是井冈山的，还是逍遥派，都要向楼里搬运砖头或其他能打伤人的重物，有的还弄了燃烧瓶，命令大家与攻楼者决一死战，与38楼共存亡。

这个时候，我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虽然不知道工人、解放军是谁派的，要干什么，但从他们被蒯大富抵抗仍然要顽强进入，就觉得这一定有来头。对我们反对武斗的人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但，当务之急是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怎么办，“共存亡”，决不干；躲避，又没处去，只好见机行事了。让搬砖头备战，自己就虚于应付，消极怠工，得过且过。

井冈山人恐怕比我还高兴。几个月来，他们不仅基本的食宿难以维持，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新北大公社不仅对他们实行全方位的封锁，还采用各种形式“挖山不止”。井冈山广播站每天播放为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词谱成的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歌唱家低沉的嗓音，给蜗居在几座楼里不能随意出行的井冈山的同学们极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既感到无比的悲壮，也感到无比的压抑，还对未来感到茫然。

7月28日，我们果然听到了好消息：进驻清华的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的。进入高校是为了制止武斗和结束派性混战的混乱局面。还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当日凌晨接见了首都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批评了他们。后来断断续续听到，毛主席说道：今天是找你们来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是实行军管；二是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个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说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毛泽东这些软中有硬的话语，五大领袖当然不能“商量”、“讨论”，必须认真迅速贯彻落实。不管想通想不通，按当时林彪的话来说，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聂元梓肯定就非常不理解，但是她也不得不执行。只是在执行中还要加上点自己的东西。当天，北大校文革发了一个《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新北大公社总部则发了一个支持《通告》的《声明》，要求井冈山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和一切漏网分子”，还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翌日，公社还给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封信，欢迎他们进驻北大。但强调“在校文革领导下实行大联合”。8月5日，公社又发出《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第四号通告》，要求大家“向正在作垂死挣扎的反革命集团发动猛烈进攻”。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担任总指挥。20日晚上，宣传队召集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有关协议：一是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是对宣传队不能两面三刀；三是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是着手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是停止互相攻击等等。此后两天内，公社、井冈山分别上交武斗工具。公社的是：扎枪、长矛930支，铁棍200根，安全帽518顶，护甲336件；井冈山的是：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小口径子弹37枚。

8月21日晚上，宣传队第一次与聂元梓及校文革的全体常委作第一次接触，并向他们提出3个问题：为什么井冈山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采取了什么态度？校文革支持武斗，要不要承担武斗造成的损失和责任？校文革作出4项决定：主动到井冈山住区帮助拆除武斗工事，把井冈山人员未领的工资送去并承认错误，聂元梓接受批判，给井冈山人员解决吃饭问题，以后政治、经济、生活上一律平等。28、29日，公社、井冈山先后宣布解散，9月3日，全校实现大联合。

为期数月的武斗终于结束了，差不多两年多派性互斗的混乱局面终于结束了，应该说，北大绝大部分像我这样的同学都衷心拥护。起码我们不会再为要不要违心地参加武斗而犯愁，也不会再为无家可归而担忧。其实，真正愿意参加武斗、愿意为所谓“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流血牺牲的同学是极少数人。我就问过公社的几个武斗队员，他们都表示这是不得已、没办法。武斗来了，不参加不好意思，没有勇气，怕人家说自己是怕死的胆小鬼。现在想来，真是荒唐可悲！

武斗给国家资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就楼房来说，北大学生宿舍区的17、19、20、29、30、32、34、35、36、37、40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等11栋楼的门窗玻璃和扇框全部被打碎，28、30、35、36、37等5栋楼的暖气和灯光设备均被拆毁，里面的家具全被损毁（其中28楼是为留学生置办的家具用具）。聂元梓的公社派还在武斗中损坏了“五四”操场的20万红机砖，井冈山在30、35、36、37楼下面2米深处挖了高1.7米、宽一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基础受到严重损坏，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毁了。公社派从建筑材料中用了4吨二分之一的镀锌管做了长矛。井冈山没权，无法动用学校的现成物资，就把他们占住楼房里的暖气管截下来做长矛。学校的双层木床原来有5300张，武斗中毁坏了3000张，另外，还损坏四屉桌600张，大二屉桌240张，留学生用的大衣柜200个，椅子270把，书架250个，毛巾500条，棉衣600件。这棉衣自然是做了公社派的武斗服，那时候公社武斗人员每人一件黄军装棉袄，被井冈山嘲笑为“老佛爷”聂元梓赐给的“黄马褂”。

北大武斗的产生、发展与恶果，原因很多，但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聂元梓校文革无疑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毛泽东是洞察一切，他称北大校文革是“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打死人文革”。新北大公社的一般群众，也都是“受害者”。

几十年后，看到一份资料，说是北京高校清华北大武斗的状况，没人敢向毛泽东反映，还是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这时作为父亲的联络员，了解到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经过思考和权衡，派出工军宣队进驻高校，制止武斗，结束了到处武斗、全国内战的混乱局面。

~~~~~  
【读史笔记】

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

• 金大陆 •

—

红鸥，是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二女生侯美度，在文革初期，为迎合革命造反大势而改取的名字：

“我给自己起名叫红鸥——红色代表理想，代表光明，代表革命，海鸥是自由的象征。我生长在黄浦江畔，小时候就喜欢看黄浦江上自由飞翔的海鸥。

“飞吧！红鸥，自由自在地飞，不怕惊涛骇浪，不畏雷鸣电闪，飞向理想，飞向光明，飞向革命！”（《红鸥自传》第22页，下文仅标页码）

红鸥——这只自喻为红色的闪电般飞翔在惊涛骇浪之中的“革命造反”之鸟，确实是为文革运动而“生”的人。恰如红鸥自述：

“我以前总是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20年，早生20年就可以参加革命了。现在好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参加了革命，我就什么遗憾也没有了，这场革命真伟大！与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一样惊心动魄，一样你死我活。

“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从小我们就烂熟于心，谁不仰慕英雄？谁不做英雄梦？”（第19页）

红鸥满腔热血与豪情，满脑“英雄梦”。中国的“革命”与“继续革命”，借托着长久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很快就点燃了稚嫩而肤浅的灵魂，致使红鸥在学校里模仿北京红卫兵（市东中学是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活动的一个“点”。市西中学也是），起草了《红色恐怖》宣言书（并印成传单散发），成立了“红色恐怖战斗队”；继而，“杀向社会”，在一片“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唱中，火烧了杨浦区图书馆的藏书；继而，只身北上，又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地红卫兵的会议上（张春桥在场），

“腾地跳出来，几乎是小跑地跑到主席台，递给大会主持人一张纸条”，要求“代表上海红卫兵”发言……正是“红鸥”这种划响天空的飞翔和鸣叫，使之很快融入了高校红卫兵的队列，并以一所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的名义，与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上海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筹建了市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红鸥在市东中学并没有群众基础，她连通过班级选举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正式名额都轮不上。但红鸥却能在那个波涛滚滚的乱局中，乘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大势，呼地蹿上了“革命造反”的云端。这大概可以是红卫兵运动史进入“深部和细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即“人物与组织与运动”的构成）。

上海“炮司”在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短暂而显赫的，其重要的特点和功能是率先发动了“工学运动”。所以，红鸥就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内，跟随复旦大学的周谷声、胡守钧，交通大学的许云飞，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林翌，上海师范学院的江必雄等一批大学生红卫兵，跻身于上海文革运动的重大事变中——殊不知，红鸥参加了上海“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并以红卫兵的身份赴国棉十七厂、三十一厂外调了王洪文、黄金海的政治情况（昨日的

必需是今日的荒诞)；红鸥两度随送面包的车辆，到达安亭事件的现场，并追击到苏州、南京，动员“工总司”“二兵团”“一兵团”返沪；红鸥出席了陈丕显在市委东湖路招待所主持的各造反组织会议，见证了《急告全市人民书》的讨论过程；红鸥参与了“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并代表“炮司”宣布退出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会（“炮司”曾是毛泽东称赞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讨论者之一；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之一），直至在“反逆流”中被剥夺了“红卫兵资格”……。确实，在一片激荡中，红鸥如同一只火鸟，腾空呼号，叱咤风云。红鸥不仅成就了她自喻名称的寓意，甚至成为大众传播的话题，成为“革命造反”的“偶像级”的精神象征。就是在那个时候，笔者作为一个文革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因没有资格成为参与者），曾在复旦一会上，经同学（一复旦教工子弟）的指点仰视过“红鸥”和“海鹰”，她俩一头短发，斜背挎包，像精灵一样在台上蹦来跳去。那幅图景至今可复演在眼前。但眼前的红鸥——虽然本书的署名仍然叫“红鸥”——却再也没有“火鸟”和“精灵”般的风采了。为了本书的修改，笔者拜托文革研究工作者李逊帮助红鸥订正一些史实，为一些非亲历的段落做出注释。李逊回复同意，却说：红鸥很固执，很难沟通。我也有同感，甚至感到这大概就是红鸥当年“革命造反”的个性基因和精神的延续。

## 二

如果说以上是红鸥所经历的“革命造反”的高潮，那么，当红鸥从高潮中跌落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1967年4月至9月，红鸥为“用鲜血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以赴死的决定赶往武斗激烈（红鸥自述是“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重庆、乐山和开封。红鸥在给周谷声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使命在身，我能躺下不干吗？使命在身，我能自暴自弃吗？

“……亲爱的战友，你看哪，全人类解放的日子近了，近了，愿那一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那一面最红最红的旗帜是我的鲜血染成。

“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第150页）

1967年下半年，红鸥从外地返沪后，立即投入“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简称“中串会”。总部设在光明中学，共2万多成员）的活动。“中串会”乃被称为原“红上司”“红反会”等部分市一级的“老造反”红卫兵，因不满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建时，遭来自张春桥、徐景贤的冷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的高潮中，曾纵横驰骋，冲锋陷阵的一群——却在新一轮“代表权”的确立中（实为“权力再分配”），被来自基层的“老造反”，却在“大联合”和“军训”等政治需要中脱颖而出的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的代表所替代（此类“替代”的例证，还包括“一派分化”“另派重起”等，在1967年中国各省区的造反派队伍中比比皆是。旗号上有“主义”和“原则”，形态上有“过程”和“状况”，核心还是“权力”和“权利”）。于是，红鸥与他人合写了《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刊登在影印版的《红卫战报》上；参与了“中串会”组织的千人大游行，从长宁区俱乐部出发，经静安寺沿南京路至外滩，一路高举红卫兵大旗，呼喊着“主席健在，我们必胜”“批判新的资反路线”“中学红代会是大凑合”等口号……直至1968年上半年因形势紧迫，避退外地后，又“落网”进入了徐景贤主持的“‘中串会’问题学习班”。

1968年下半年，中国文革运动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决定了已在校“革命造反”了3年的红卫兵必须退出“现场”。那么，哪里是“出口”呢？按照毛泽东关于“革命青年”的认定标准，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上海1966届和1967届高中生的分配，大约有45%的名额在工矿企业，即便去务农，也多在外地（如黑龙江）和市郊的农场（“拿工资”），真正去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劳动“挣工分”的“插队落户”者却是少数（约10%。1968届后则为多数）。然而，以红鸥为骨干的一路“老造反”，则独树一帜地向市革委会提出到河南兰考去“插队落户”（为此，红鸥曾两度到兰考考察，并取得兰考县革委会的接受证明，直接“交给上海康平路办公室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

红鸥说：

“今天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我这个毛主席最忠贞的红卫兵能不去吗？如果不去，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到达兰考时，红鸥一行下了火车，就抬着花圈，捧着小松树，在焦裕禄墓前庄严宣誓：

“焦裕禄同志，我们上海的红卫兵踏着您的脚印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继承您未竟的事业，在兰考广阔天地里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把双杨树的道路走到底！”（据同去兰考的原“中串会”成员说，上海没有去河南兰考插队的名额。他们所以申请去兰考，追随焦裕禄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动机是：他们曾查看了地图，认为大批京沪两地的知青到黑龙江去“垦屯戍边”，将来“中苏之战”时，东北并非是苏军的突破区域，反而是经蒙古至内蒙古至中原一马平川，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所以，他们准备在兰考筑起抵抗的防线）

呜呼！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信服和追求……，如果说红鸥在“革命造反”高潮时的鸣叫曾划响天空，那么纵观红鸥在跌落时的苦斗，则充分证明了这位自喻为“天生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就是天生的为文化大革命而“生”的人，天生的为“革命造反”而“生”的人。红鸥用自己的热烈和执着，同时也用自己的轻狂和简单，写就了自己奇崛的青春史。

接着，发生的故事就是1970年初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么“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整体运动”中套着“局部运动”），红鸥因牵涉到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等“炮打张春桥”的案件被专案组特派的四人小组，从兰考押回上海，关进了复旦大学10号楼。历经近两年的隔离审查和逼供信，于1971年12月底，带着从“敌性内处”减轻为“犯严重错误”的政治结论，由复旦“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工宣队员”送回了兰考……

### 三

诚然，红鸥以其个性、信念、意志，以及家庭和教育的背景，世运和机遇的汇通，形塑成了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当时可以是先锋，甚或可以是偶像，自然与许多历史事件的现场和过程发生着关联，抑或就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那么，从“文革人物”研究的角度来说，红鸥之类的“典型”如何定位呢？

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民运动”（甚至造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这固然是总体性的形态和结论。但若做出严格的辨析和区隔，或者说给予实质性的认定，文革运动在群众中的发动、参与、争辩、对抗、斗争……，尤其至1967年下半年以后，只是少量的“积极分子”，或“骨干分子”，或“极端分子”在运动，多数人则是观望着的，逍遥着的（以至形成了一个与文革运动的“政治场”相区隔的“社会场”）。

再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其主导的方向和力量，无疑来自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即来自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决策，如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炮打司令部”，以及文革中后期的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在如此壮阔的群众运动中，在一些大关节上，有“自下而上”的举措和行动，参与并创造了历史的进程和走向。譬如在北京，有清华附中张承志等组建了红卫兵，并写信给毛主席，得到了高度的赞赏；有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率先挑战王光美领导的工作组，引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辽宁，有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倡导“徒步大串联”，并向全国推广；在武汉，有“七二〇事件”，引起文革部署的连环变化，以及后来张铁生的“一张白卷”，黄帅的“一封信”，风庆轮的“远洋航行”，刘冰的“告状”，“四五”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等等，均或从底层，或从民间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震动。在上海，最重要的此类例证就是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含经“安亭事件”，张春桥以宪法为由，“先斩后奏”地签署了承认“工总司”的“五条”），标志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以及以“反击经济主义”和“夺权”为标志的“一月革命”。本书的主角红鸥确实参与了这两项发生于上海，影响了全国的行动（至于发生于上海的两次“1·28炮打张春桥”事件，为什么不能列入此例证内，那是因其影响仅限于上海，而没能直接影响全国文革运动的大局和走势。当然，做间接的推论，不能否认上海的两次“炮打”针对的是林彪）。

基于以上对两点惯常说法的判断，再进入“文革人物”研究的讨论，便可见在“参与”的层面上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根本支撑不起“典型”的权重，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因为“参与”才有经历，才有故事，才有构成研究的可能和价值。但“参与”的层面和能动是有差异的，即“参与”的广度、深度和结果，又决定了对此类“文革人物”的评定，应做出“参与—创造”历史、“参与—进入”历史和“参与—见证”历史的区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参与—见证”历史的肯定是多数，“参与—进入”历史的肯定是少数，而“参与—创造”历史的则肯定是个别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如笔者这般没有资格“参与”的，或有“参与”资格却没有信念、志趣和激情的，则是“经历”了或“观望”了这段历史）。那么，依凭此理论的阐述，红鸥理想高扬和激情燃烧的“革命造反”，应该列入哪一档“参与—？”的位序呢？大概不能列入“参与—创造”历史的位序，因为红鸥没有像包炮那样直接主导了上海“工总司”的建立；没有像包炮、潘国平、王洪文那样直接与张春桥进行了承认上海“工总司”的谈判；没有像《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那样在上海、在全国开创了“夺权”的先例，等等。所以，对红鸥此类“文革人物”的研究，一般应该进入“参与—进入”历史的位序。对红鸥来说，这不是遗憾。正如之所以要在理论上做出“参与—创造”历史、“参与—进入”历史和“参与—见证”历史的区分（没有“参与”的则更多），恰是为了求得对“文革人物”研究的客观定位和判断。

然而，红鸥作为名声显赫的“文革人物”，在人生的履历上，是否留有遗憾呢？就一代人的“生命史”而言，红鸥作为“老三届”人，其命运俨然被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17年的求学期、10年的文革运动期（含“上山下乡”）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期。如果说红鸥（出身于上海一般的“革命干部”家庭，即并非所谓“高干”家庭，更并非类似北京的“高干”家庭）的第一阶段是幸福的，第二阶段是燃烧的，那么，红鸥第三阶段的遭际呢？就在笔者所属的文革研究小组试图联络红鸥的时候，发觉红鸥早已在公众的

视野中“失踪”了——红鸥属于思想史学者朱学勤所寻找的“失踪者”之一（文革运动时期，朱学勤只是一小学生，或称“红小兵”。但朱兄以“牛犊”之情追随着一批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包括一直追随至红鸥在内的“中串会”成员的落户地河南兰考）——然而，当辗转多时在人群找到红鸥的时候，红鸥除了捧出这本《红鸥自传》，并希望笔者竭力相助问世，成就“人生的最大心愿”外，就是喋喋地诉说当外婆带外孙“必须三时赶回家”的时间上和心理上的紧张。

于是，想到红鸥曾酣畅地宣称要“报考复旦生物系”；想到与红鸥共同奋战的复旦红卫兵周谷声、邱励欧等，均平反后去了美国深造；想到与红鸥共同奋战的交大红卫兵许云飞等，成为某一省级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想到与红鸥共同起草《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的魏威，成为《萌芽》杂志的编辑；想到与红鸥共同去兰考选址考察的王鸿生，成为文艺评论家……为什么红鸥的这些昔日“战友”，都能在“改革开放”中重新飞翔，而自称天生崇尚飞翔的红鸥，却在“改革开放”中消失了飞翔的踪影？或许红鸥的思维已凝固了，手持着平反的证明，仍停留在原有的思维惯性中；或许红鸥的激情已荡然了，日日为现实生活的困顿所束缚；或许红鸥的价值判断已发生了蜕变，人生的追念不是丧失动力就是指向空门；或许红鸥没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能力准备，难以应付种种从天而降的机会……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红卫兵的“红鸥”是骄傲的，因为曾有为“革命造反”而献身的理想和行动；作为外婆的“红鸥”则会是怎样的？（或悲哀或幸福；或失落或惬意；或烦乱或安然）但有一点应该确定：红鸥终究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没有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飞翔而起，而转换“红卫兵”和“知青”经历所遗留下来的角色定位。

请红鸥谅解，现在仍然需要回到本文的主题（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一个供后学研究的命题）：红鸥天然地为文革的“革命造反”而“生”，却没有为“改革开放”做好准备；红鸥的信念和情感仍活在那个时代的记忆中，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了。

毋庸置疑，红鸥是一位典型的“文革人物”。当年，笔者在台下仰视着这位红卫兵领袖的风采；当下，笔者受托为上海的一位普通外婆不忘青春的《自传》作序，其间可考察的脉络和机缘究竟是什么？大概是一个“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寄托和一个文革研究工作者的义务吧。

#### 四

文革的“两性”（含“两情”）关系研究，一定会成为那个“非常”年代里——社会生活史方向非常重要的课题。它大致包括可供伸展探究的三个向度：即在文革时期总体的“性禁忌”的社会氛围下，文革运动中男女“战友”间所萌发的“两性”（含“两情”）关系；文革运动中发生于种种特殊情况下的“性交易”“性贿赂”“性欺骗”“性侵犯”（“性暴力”）等；文革中期以来所谓青少年“流飞”活动中的“性诱惑”“性骚扰”（上海称“搓拉三”；北京称“拍婆子”）和“性行为”（“性教唆”“性淫乱”）等。当然，作为本书主角的红鸥，作为一个典型的红卫兵人物，其情感的故事肯定属于第一个向度。

自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时的投入，至1971年作为“胡守钧小集团案”主要成员审查完毕，在红鸥5年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革命造反”的经历中，共与异性发生了三段感情（俗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段，是红鸥暗恋复旦大学的周谷声。在周分配前夕，“我几乎天天到他学校去，常常在他宿舍抽屉里偷偷放几个我省下来舍不得吃的咸鸭蛋、鸡蛋。天长日久，暗生情愫，我们之间一种超过友谊的恋情正在不知不觉地增长。”（第208页）第二段，是同学“瓦西里”（后分在港务局当装卸工）痴恋红鸥。红鸥说：“他常常来看我，却常常不说一句话，丢魂落魄地站在那里。”（第209

页)即便红鸥受审,仍不离不弃,但红鸥表示“擦不掉初恋刻在我心上的痕迹”,只是敬他,而不爱他。第三段,是红鸥与复旦附中陈大东(昵称“阿哥”,分配在上海工矿)的热恋。陈大东的情书:“我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天鹅,在宇宙间遇见了你——红色的海鸥,我们双双飞呵,永远飞翔,妹呵,那一天不会太远!”红鸥则“心里泛起无限柔情,飞快地在他的签名上吻了一下”(第223页)。但当红鸥被关押审查后,两年来“血尽泪干也写不完我对阿哥的爱”,终于断弦了。

红鸥这个高二年级的女生,在“革命造反”年代里产生的“情爱”,就如同“革命造反”一样的热烈(及女性特有的缠绵)。是红鸥浪漫洒脱,率性而为,随性而至?是红鸥卓尔不群,决意抗拒社会“性禁忌”的压迫?想必红鸥也难以准确回答这般的追问。确实,“革命”(造反)与“爱情”的主题永远是并举的——因为“革命”(造反)而处于激荡之中;因为立场一致而爱憎分明,价值趋同;因为比肩奋战而共举杯,共患难……同为年轻人怎能不迸发出情爱的光芒呢(甚或“革命”就是为“爱情”而奔赴的;“爱情”就是为“革命”而点燃的)!毋宁说红鸥暗恋着周谷声,又热恋着陈大东,就是大名鼎鼎的蒯大富与清华附一女红卫兵的情爱,不也成为京城热门的话题嘛!

然而,不幸的是文革这场“造反”运动,恰是“祛爱”的(“阶级友爱”另论),任何理念中的、艺术中的,还有意识中的、现实中的所谓“爱情”,均属于“资产阶级的伦理”范畴,而遭遇隔绝与批判,以至通过社会舆论和群众专政,形成了一个以“灭人欲”为圭臬的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所”,监视着、驱散着、鞭挞着一切男欢女爱(北京红卫兵至上海串联时,捉拿黄浦江边携手恋爱的男女;里弄居民向城市民兵、派出所举报“搞腐化”的偷情者;孩童们则向树荫下双双出行的年轻男女吼歌谣、扔石块……但至文革后期,上海团市委“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分头在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设点观察。据报告:傍晚,在北京东路外滩至南京东路外滩200多米的江堤上,就有600多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其中将近200对“动作不正常” )。

吊诡的是:红鸥和蒯大富等红卫兵偶像级人物,却在“革命造反”中恨爱交加,这充分证实那柄来自“道德裁判所”的劈杀之剑,面对人性、人情、人欲的坚持和蓬勃,其作用亦是有限度的。此中,这限度外在地表现为“行为形态”(行为方式)上;内在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道德判断)上。因为压迫是外在的,扭曲才是内在的,所以关键在于当事者的认知和接受——即是否已进入了内心,占据着内心,使内心畸变了(更可怕的是形成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此外,红鸥在“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奏中,尽管在“行为方式”上也有谨慎,表现为“抽屉里偷偷”放几个蛋之类,在道德判断上则是交响明亮的——于是,从少女之“爱情”反衬红卫兵之“革命”的角度来说,再一次回到本文的主题:红鸥以绝大的牺牲精神投身“革命造反”,作为一个时代的红卫兵人物,其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忠诚,就如同少女对仰慕者的爱恋如此单纯一样,应该是不必怀疑的。

为了这篇代序言,笔者对红鸥说:你曾经飞翔过。红鸥说,我的翅膀折断了。这大概就是红鸥的青春骄傲(“外婆的故事”),也是红鸥的一生悲哀。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7月号

~~~~~

【史海钩沉】

第一座毛主席像修建始末

• 杨涵舒 •

1966年8月，以“破四旧”为名，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拆毁，之后在原址上修建了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从而引发了各地争相修建毛泽东塑像的热潮。

“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191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梁实秋曾经这样描述它早年的风貌。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门，以清朝的皇家园林为基址，原为康熙皇帝的行宫——熙春园的一部分，后被拨做游美肄业馆，即清华学堂。修建校舍时，“乃先支银七千一百七十二两，筑围墙六百五十二丈”。1911年初，随着围墙的合拢，校门建成，其大拱门的两侧各嵌两根西式立柱，门楣上刻有清末要臣那桐的手迹“清华@”，古典优雅的校门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标志。1933年，清华大学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

◇ “二校门”的倒掉

1966年8月24日下午，伴随着“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声，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古典西洋砖石结构大门，在锤子的敲击下，在汽车拉绳的拖曳下轰然倒塌，“二校门”周围的大字报则在被撕毁后付之一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九十年》对此记述：“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纠集11所中学的红卫兵来校搞红色恐怖，撕毁所有大字报（其中有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推倒‘象征封资修’的二校门。后被称为‘八·二四’事件。”

“二校门”被毁事出偶然。1966年8月19日，清华大学贴出了质问王光美的大字报，王光美是当时进驻清华大学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骆小海回忆：“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

当时的电子系研究生、后来加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414派”的陈弘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刘菊芬和贺鹏飞的带领下，上千名红卫兵冲进清华园，拉倒了‘二校门’。他们把一些校、院系领导和‘黑帮’拉出去游街，拉倒了‘二校门’后就押着他们拆，拆完了搬砖。当时主要是中学的年纪比较轻的红卫兵，他们自己也干。”

处在被押之列，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胡健对此有着惨痛的记忆：“那些造反的人，用皮带抽打着被抓去的干部拆墙背砖。背砖不是量力而行，而是给多少，就得背多少。因为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

“这是清华无政府状态的开始。”时隔40余年后，旁观了“八·二四”事件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弘毅这样总结。

◇ 提议修建毛主席像

1967年初，在一次开会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程国英提出了一个主张：“二校门”被拆后，显得空空荡荡，是否可以在那里立一座毛主席塑像？这一想法立刻

得到了当时实际控制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1〕）的支持。
“我相信那时的提议不是政治投机，而是对毛主席的敬仰。”当时的雕塑组成员郭德庵说。

雕像筹备组很快成立起来，包括美术教研组教研室主任、雕塑家宋泊，青年教师郭德庵和宋泊的夫人徐沛贞。“团派”派来的高鲁冀担任负责人。

做塑像首先需要设计稿，年过半百的宋泊尽管在雕塑方面已经颇有经验，仍不敢贸然动手。已经被划成“右派”的他早就挨过清华附中“造反派”们的打，对雕像蕴含的政治风险也心中有数，加之时间紧迫，筹备组很快在北京雕塑玉器工厂选定了叶毓璋做的一座九十多公分高的毛主席全身像设计稿，并得到了“团派”负责人的同意。

“我们是按照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形象选的。毛主席穿军大衣、戴军帽，向群众挥手。”79岁的郭德庵回忆。设计稿拿回来后，光是放大就用了1个多月。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的雕塑家张松鹤也在后来加入。“因为张松鹤是党员，给毛主席像塑脸的任务就交给他，宋泊和我负责做身体和衣纹。”

郭德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最后浇注完水泥，有一道工序叫‘剁斧’，因为这样表面就像花岗岩了，要把它剁平。我们教研组所有的老师都参加了，有些不是搞雕塑的，也都上去过过瘾。”这座塑像不同于以前的空心塑像，而是采用钢筋水泥进行了实心的灌注，这项工程是由清华大学土木系自行完成的，“自己舂水泥、用的是麻花钢，（塑像）腿上的粗钢筋一根挨着一根排得密密麻麻！”郭德庵说。

1967年5月4日，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原址上，全国第一座大型毛泽东塑像正式落成。

◇ 第一座毛主席像的轰动效应

1967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记载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落成时的“盛况”：

四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

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八点一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1964年入校的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王文中和他的同学们负责毛主席像周边的警戒、保卫工作：“由于没有革命者应该高、大、全的概念，我们在安排人员时，几乎都是自愿报名，谁积极就让谁上。结果一个小个子的曾同学给放在了主席像的左前位置上。”

这一安排引起了一些记者的不满，他们认为安排的人员个子太矮，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和红卫兵的形象。“为此我们还绞尽脑汁，编了一套善意的谎话，将曾同学给哄了下来。”王文中回忆。

“团派”还专门在塑像旁装起了当时罕见的钠灯，四面照得通明。取代了“二校门”的毛主席像成了新的景点。因为毛主席像的高度要远远超过原来的“二校门”，人们需要退到几十米外才能够照全景。各地为造毛主席像，前来参观取经的也络绎不绝。“团派”特地抽出专门人手，负责把雕像组从放大到浇注整个过程编成一套材料，以供来访者索取。郭德庵

还记得：“北大西门、二炮司令部都用了我们的模子。有的外省市干脆开汽车来到学校，请我们翻模好再用汽车拉回去制成成品。”

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刊登在1967年5月1日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5月4日该题词手迹就迅速出现在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底座上，这种“完美”的组合形式也被许多地方在塑像时效仿。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后，该手迹被清除。

◇ “三数模式”

毛主席塑像和毛主席像章、红宝书一道，成为了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在那个年月，人们对领袖的热爱之情难以抑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韶山火车站、海军大院……从南至北，毛泽东塑像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由于校内的红卫兵派别互相对立，北京大学甚至先后在北大西门和图书馆处建起了两座毛泽东塑像。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座毛泽东塑像一模一样，相对挥手，隔街相望。

在上海，“工总司、同济东方红、上体司、红三司、外语学院革造部、红卫兵新复旦师、新师大师”等十七个红卫兵组织听到清华大学塑毛主席像的消息后，提出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尽管巨型立像没有造成，但各大学都纷纷建起了毛泽东塑像。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修建的毛泽东塑像高7.1米，加上底座3米，总高度达10.1米，且底座上和清华大学一样刻有林彪题词“四个伟大”。

复旦大学红卫兵“新复旦师”则在修建毛泽东塑像时独创了一套完整的“三数模式”：像高7.1米，加上5.16米的底座，分别纪念中国共产党在7月1日诞生和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即“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而7.1加上5.16，正好是12.26，又是毛泽东的誕生日。这套“三数模式”也被许多地方在修建毛主席像时仿效。

“后来到处都建，有些地方就做得差。北大图书馆前面那个毛主席像就不好，脸型、衣服不太像主席了。清华这个像立起来时，一片赞美，没有听到人说不好的。”身为当年雕像组的一员，郭德庵至今仍感光荣和自豪。

◇ “塑像热”退潮

没有人能统计清楚，“文革”期间全国党政机关、学校、城市公共设施，包括村庄在内，到底曾立起了多少座毛泽东塑像。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文件发出的当天，人民大会堂前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被两辆吊车取下。

尽管《指示》中主要讲到的是画像，但一些地方的毛泽东塑像也开始被拆除。3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在11月6日发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塑像问题的通知》称：对已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塑像或其他坚固塑像，没有必要一下子全部毁除。现在有一些地方为了塑像问题引起了争端，中央希望，凡在有争议的地方，一般不要拆毁。

到了2008年，包括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在内，北京的高校中还有7座毛泽东塑像伫立，其余则已拆除，清华大学也不例外。

“（拆除的过程）大部分师生都不清楚，但是肯定是经过精心的部署和组织，”清华大学教授陈弘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是学校党委下发了一个通知，向教师们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拆像。那时‘左’的思潮已经过去，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于是在很小的范围内组织了人手，在夜里（把塑像）取下来迅速运走了。”

这时已是1987年的夏天。8月26日，校方先在清华主楼大厅挂起了直径2米的圆形毛泽东青铜浮雕像，“以代替目前已局部破损的位于‘二校门’位置的旧塑像”。3天后，曾轰动一时的第一座毛泽东塑像一夜间消失了。

◇ “二校门”重生

“文革”时期，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8、9月间，清华大学“二校门”也是其中之一。

2009年11月，灰白相间的“清华园”二校门在清冷的风里静静肃立，两旁的自行车和行人来来往往，不时有人在这里合影留念。万泉河的一条支渠从门口流过，两岸树木成荫。

这是1991年清华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日前夕，重新修建而成的新“二校门”。由于没有准确的原建筑图，现在的“二校门”是根据照片复原而成。1990年1月31日，26个清华大学各地校友会发出了一份《关于赞助重建二校门的倡议》，提议由校友捐款，在原址重建。

1990年退休的郭德庵则尚有遗憾：“原址建‘二校门’当然很好，但是拆掉的毛主席像应该保存下来，可以移个位置嘛！毕竟这是全国第一座，值得纪念！”

按照清华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筹备组公布的捐款情况，当年有5100多位校友和21个校友组织为“二校门”的重建工程进行了捐助。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则像现在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弘毅一样，浸淫于自己的专业，对这种“政治化”的活动已经不再关心。而对于“二校门”的历史风波，无论是当时的造反者、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生刘菊芬，还是当时的被批斗者、清华附中教师尚富珍，都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访问，称“年纪大了”“不想再说过去的事情”……

不少经历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选择了埋葬这段记忆。

清华大学校友、学者翟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说：“老‘二校门’、毛主席塑像再到新‘二校门’，把清华和清华人分成了三个时代。”

编者注：

1、此处“（简称‘团派’）”应删除，因为此时井冈山兵团尚未分裂为团派和414派。

〔原编者附记：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30日出版的第44期《中国新闻周刊》上，作者杨涵舒系该刊记者（现已不在该单位）。文集刊用前已征得《中国新闻周刊》同意。曾有校友把此文转载在清华大学校友网上，引起众多校友的热议。今选择部分跟贴，以飨读者。〕

一、对塑像建造过程的补充

那向谦：

1967年的初春，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了“疾风暴雨”，全国大串联与派系争斗之后，大多数同学们冷静下来。

此时，建工系65级学长高鲁冀（原清华党委副书记、高教部副部长高沂的侄子）从其工作单位（北京一建公司）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高鲁冀在清华第一教学楼成立了“毛主席塑像建造办公室”，其成员主体为建工系的美术教研室教师、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及知名的雕塑家。

我的记忆中，这尊钢筋混凝土内核，外表为剁斧石的毛泽东塑像是由清华建工系的美术教师会同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联合塑造，在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去深究谁是“主创”。

清华大学这尊毛泽东塑像建成后，解放军的三总部、各兵种司令部和在京高等院校最先跟进，也相继在主楼广场上建成了毛泽东塑像。进而，在全国各地，毛泽东塑像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耸立起来。

高鲁冀当之无愧成为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拓荒者”，他的办公室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基于此，高鲁冀来到了建零班，招募能够跑腿、绘图的年轻人进入他的办公室。建零班的戚荣林、徐治惠、焦毅强、章询文、姚重光等成为“毛主席塑像建造办公室”新的生力军。我也在其中挂了名，但仍保持着游击习气。在那个年代，我们能和高鲁冀外出，吃上一顿免费午餐，获赠一本精致的“语录”或一枚“像章”就十分得意了。

高鲁冀和“毛主席塑像建造办公室”最宏伟的一项计划是在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支持下，在井冈山黄洋界的山顶巨石上雕成毛泽东头像，其规模和尺度都超过美国黄石公园洛基山脉上的美国四大总统雕像。为此，高鲁冀做了实地考察，同时完成了小比例模型雕塑像。

这一年底在高鲁冀的组织下，我们在韶山火车站站前广场的小山顶建造了一尊毛泽东青年时代形象的钢筋混凝土塑像。这尊身着长衫，昂头挺胸，叉腰挥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塑像面朝东方，包括基座总高度为12.26米，寓意毛泽东誕生日12月26日。塑像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师创作，由清华“毛主席塑像建造办公室”承建，我与清华美术老师到韶山现场完成了塑像剁斧石面层塑造工艺。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高鲁冀移居美国旧金山，经过打拼成为一名成功的文物商人。

二、对林彪题词的讨论

胡鹏池：也谈“四个伟大”的由来

（1）“四个伟大”的雏形：3 + 1

早在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那天，九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项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

十时正，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他在致词中，非常醒目地给毛泽东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

接着林彪讲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

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统帅”的头衔。

3 + 1 = 4 了，这是“四个伟大”的雏形阶段。从此以后，毛泽东就有了四个头衔，以后被人们称之为“四个伟大”。

“四个伟大”，其中三个最早是陈伯达提出的，只有一个“伟大统帅”是林彪提加上去的。

这就是“四个伟大”的由来。

（2）“四个伟大”的雏形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得到毛泽东的首肯笔者注意到在吴法宪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大会开始前，负责大会保卫工作的吴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

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四个伟大”中的“三个伟大”与“一个伟大”是毛泽东审阅时分别同意的了。

（3）“四个伟大”的第一次合成

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就写出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根据穆欣的回忆，将“四个伟大”作出这样排序的是康生。

所以说，林彪、陈伯达、康生都是“四个伟大”的原创者。

（4）蒯大富对“四个伟大”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有功劳的，但不能夸大

2011年4月27日校友、网友聚会时，孙耘与唐伟曾经专门将蒯大富唤过来，要澄清几件事情。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是否你老蒯“拟稿”？

蒯毫不含糊地回答：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确实是我拟稿。

蒯随即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67年春末，位于二校门的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应当是全国第一座——老蒯当之无愧）。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老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加上“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

显然，蒯大富写的条子并不是原创，他是抄袭的《人民日报》的合成，但去掉了“我们”两个字，加上了“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及两个惊叹号。

蒯大富对“四个伟大”的形成与传播是有功劳的，但“功劳”就这么大：第一是抄袭；第二是增减字；第三是请林彪题词。这最后一条很是最重要，没有蒯大富之请，就很可能没有林彪的这一题词。

（5）“四个伟大”的正式发表

林彪题词的手迹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

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这样一宣传，林彪原本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的题词正式改变为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题词的份量加重了，但清华与蒯大富的份量降轻了。

（6）变更原因的分析

如果这样的变更是由林彪直接指示的话，很可能与林彪本人对蒯大富的看法有关。林彪对蒯大富是有看法的。

林彪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一天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林彪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

当然这话是在林彪题词之前，但说明林彪内心对打倒刘少奇是并不十分满意的，那么对在“打倒刘少奇”中冲锋陷阵的蒯大富的不满也由来已久了。

如果这样的变更是出于叶群的主意，那就说明叶群“眼光远大”，她想利用这件事加大炒作力度，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7）结果

由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首先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继之，《人民日报》又对此进行大力炒作，紧接着由林彪题词的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四个伟大”就成了神州大地的一股旋风。从此，“四个伟大”，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开来，同时也与林彪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在“四个伟大”综合之前，中共高级领导人、普通群众，对毛泽东的称谓都是各说各的，无非就是领袖、导师、领路人、大救星……这些好听的名词中任意选择并任意组合。

笔者注意到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曾说毛泽东是“艄公”，更早在延安整风时期，陈毅也已经称呼毛泽东为船老大了，这些称呼都已经含有“舵手”的涵意了。

自从林彪作了“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全党、全国人民这才口径高度统一，动辄就是“四个伟大”，连排序也不能改动的，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创了，也没有了自创的余地了。

所以说，林彪并不是“四个伟大”的原创者之一这句话有一定道理的，但林彪同时又是“四个伟大”的集成者、专利注册者，毛泽东既是“四个伟大”的审批同意者，也是受惠者。当然作为“专利拥有者”的林彪也是受惠者。因为当毛泽东享受“四个伟大”及三个“万寿无疆”的同时，林彪也享受了两个“永远健康”。

其它任何人（包括陈伯达、康生、周恩来），谁也从来没有与林彪争抢这个“专利权”。

蒯大富当然更不能争，你毕竟是小八答拉子，能沾上边就不错了。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